

# 浅析三星堆遗址“新二期”文化遗存

——兼谈“鱼鳧村文化”

雷 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摘要：**三星堆一期与二期文化遗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缺环。1999年以来，在三星堆遗址的多个地点发现了一组新的文化遗存，文化面貌介于三星堆一期和二期之间，并与温江鱼鳧村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的陶器群几乎完全相同，从而填补了三星堆一期与二期的缺环，也基本上解决了三星堆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与青铜时代文化遗存陶器群的传承关系。新遗存中的A组陶器是“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晚段的常见器物，但新出现的B组陶器已明显属于三星堆文化的范畴，因此再将这组遗存归入“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显然是不合适的。考虑到以这组器物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在成都平原有着广泛的分布，因此将其单列出来，命名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是适宜的，也是必要的。

**关键词：**三星堆遗址；宝墩文化；新二期；鱼鳧村文化

**Abstract:** The main cultural remains of the Sanxingdui site are divided into four major periods, but there is an obvious missing link between the cultural remains of Sanxingdui Period I and Period II. Since 1999, through new excavations and the sorting of materials from previous excavations, a new group of cultural remains has been found in several locations of the Sanxingdui site, with a cultural appearance between Sanxingdui Period I and Period II, and almost identical to the pottery group of the Period III cultural remains of the Yufu Village site in Wenjiang. This has filled the gap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periods of Sanxingdui, and basically solved 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te Neolithic and Bronze Age pottery groups at the Sanxingdui site. In addition, besides the site of Sanxingdui and the site of Yufu Village, there are another 33 sites (locations) in the Chengdu Plain where this group of cultural remains has been found, and similar findings have been made at the Sujiaba site in Wusheng County in the eastern part of Sichuan Basin.

Although Group A pottery in this group is common in the late stage of “Sanxingdui I - Baodun culture”, the newly emerged Group B pottery already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Sanxingdui Culture”, so it is obviously inappropriate to classify this group into “Sanxingdui I - Baodun Culture”, and at the same time, in view of the high proportion of Group A pottery and the fact that Group B pottery has not yet occupied a dominant position, it seems inappropriate to include it into “Sanxingdui Culture”, considering that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al remains represented by this group we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Chengdu plain, so it is appropriate and necessary to single it out and name it as a new archaeological culture.

**Key Words:** Sanxingdui site, Baodun Culture, New Period II, Yufu Village Culture

## 一 前言

三星堆遗址的主体文化遗存上下延续逾2000年，共分为四个大期，其中第一期文化遗存时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其时代跨度、文化面貌与公布材料早、外界比较熟知且同处于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基本相同，被学界广泛认知为“宝墩文化”“三星堆一期文化”或“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三星堆遗址第二、三、四期文化遗存为青铜时代文化，或被统一认知为“三星堆文化”、或被分别命名为“三星堆文化”（二、三期）、“十二桥文化”（四期）或“三星堆——金沙文化”（四期）。

长期以来，三星堆一期与二期文化遗存之间在通过陶器群体现出来的文化面貌上还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缺环，因此，三星堆文化主体的来源，还没有人敢说直接来源于“三星堆一期文化”、“宝墩文化”或“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

199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月亮湾地点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主动发掘，一方面确定了月亮湾土梁埂（横梁子）是一道人工堆（夯）筑的城墙，另一方面在月亮湾城墙内侧居住址第⑩层、第 层以及第 层下的遗迹中发现了一组新的文化遗存，文化面貌和年代介于三星堆一期和二期之间（距今4100年~3900年）。2006至2012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在《广汉三星堆——1980-2005年考古发掘报告》的整理过程中，通过对历年发掘资料的全面梳理，在“1980三星堆地点”“1984西泉坎地点”“1984三星堆地点”“1986年三星堆地点”“1991年西城墙地点”以及“2000年月亮湾地点”的发掘材料中，均辨认出了类似于“1999年月亮湾地点”的这组文化遗存，2017至2018年又在西城墙中段内侧一濒临古河道的“河边祭祀遗迹区”的发掘中再次发现了这组遗存，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使得原本有明显缺环的遗址分期和文化演变序列变得环环相扣，也基本上解决了三星堆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与青铜时代文化遗存陶器群的渊源和传承关

系，这对于解决遗址的分期和文化发展序列、了解三星堆遗址范围内各期文化遗存的分布状况都极具价值。<sup>[1]</sup>

## 二 关于三星堆“新二期”文化遗存

由于这组新文化遗存陶器群的出现，笔者对原有的三星堆遗址的分期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将这组新文化遗存视为三星堆遗址的第二期，以前的第二期则变为第三期，第三期变为第四期，第四期变为第五期（实际上近年来在三星堆遗址的多个地点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晚于第五期的文化遗存，时代相当于新一村文化时期，是否纳入遗址的主体文化遗存并将其划为三星堆遗址第六期，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在《广汉三星堆——1980-2005年考古发掘报告》正式出版之前，为避免分期调整可能引起的混沌与不便，本文暂将其称为三星堆遗址“新二期”文化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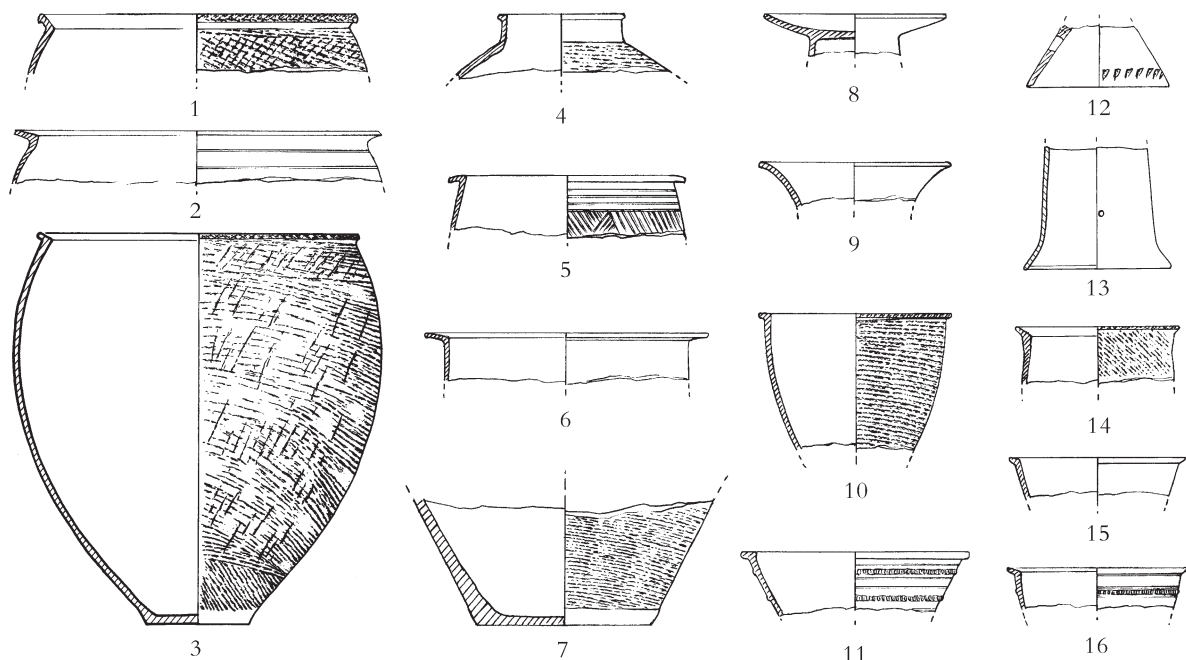
“新二期”文化遗存陶器可明显分为两组，共存于不同的地层和遗迹单位。

A组 包括喇叭口高领罐、绳纹花边口罐、绳纹花边口尊（盆）、折沿尊、折沿盆、折沿罐、圈足盘、直口罐、镂孔圈足器等，是三星堆一期文化晚段和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城址群晚段的常见陶器组合（图一）。

B组 包括敛口瓮（缸）、绳纹小平底罐、绳纹深腹罐、绳纹侈口罐、绳纹釜形罐、瓦棱纹器盖、器盖、瓦棱纹高柄豆、高柄豆等。器物组合和单个器类常见于三星堆遗址第二至四期，但单个器类的器物形态又明显早于三星堆二期的同类器（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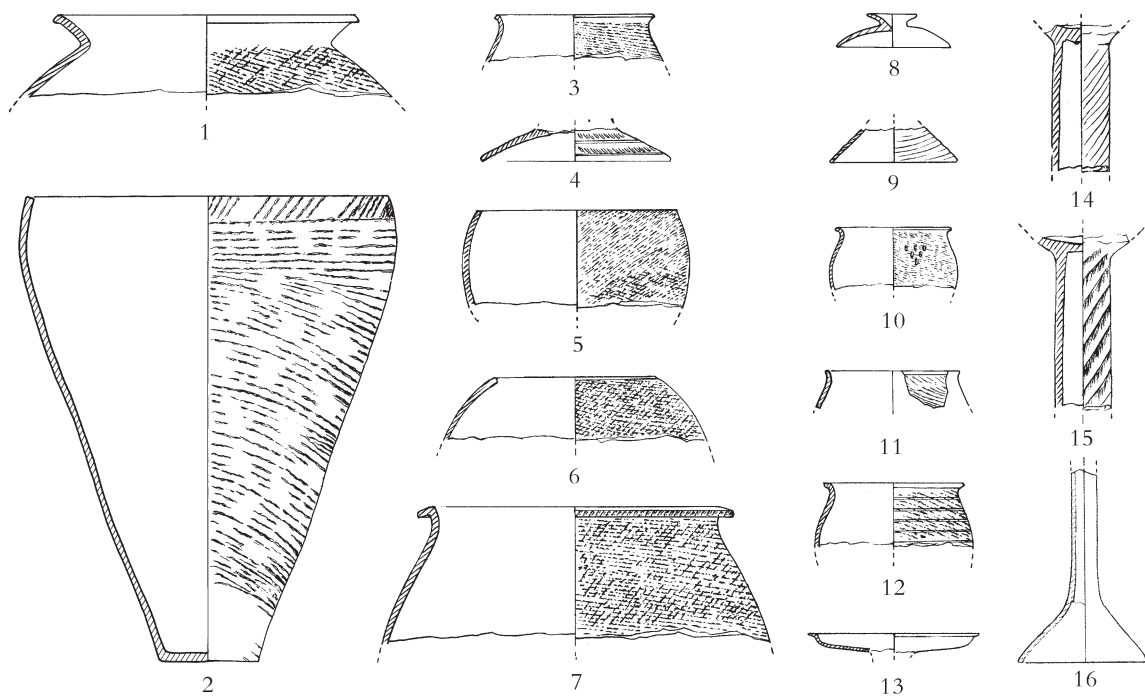
三星堆遗址“新二期”文化遗存与成都市温江区鱼凫村遗址的第三期文化遗存<sup>[2]</sup>陶器群的文化面貌十分类似，几乎完全相同（图三~五）。<sup>[3]</sup>

此外，通过对已发表资料的梳理和比对，我们发现成都平原除三星堆遗址和鱼凫村遗址以外，还有33处遗址（地点）或者属于这一时期、或者发现有这组器物的原生地层或遗迹单位、或者在晚期地层中有这组陶器的出现，这33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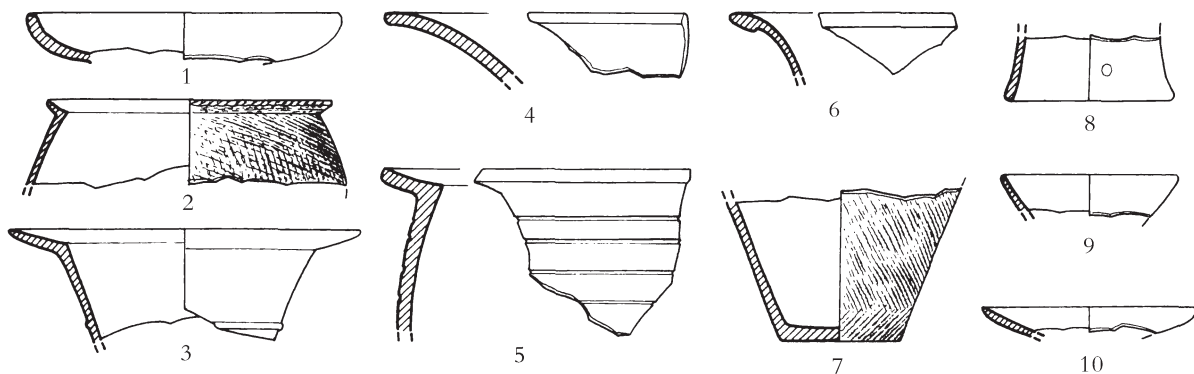
图一 1999年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地点出土三星堆遗址新二期陶器A组

1、3. 绳纹花边口罐 (99GSZY 夯: 64、99GSZYD25 : 1) 2、5. 折沿罐 (99GSZY 夯: 15、99GSZY 夯: 27) 4. 直口罐 (99GSZYH34 : 7) 6. 折沿盆 (99GSZY 夯: 5) 7. 平底器 (99GSZYT202 : 145) 8、13. 圈足盘 (99GSZY 夯: 107、99GSZYH48 : 9) 9. 喇叭口高领罐 (99GSZYH49 : 3) 10. 绳纹花边口尊 (99GSZY 夯: 78) 11、15、16. 折沿尊 (99GSZY 夯: 36、99GSZYT106 ⑩ : 8、99GSZYG62 : 5) 12. 镂孔圈足器 (99GSZY 夯: 140) 14. 绳纹花边口尊 (99GSZYT302 :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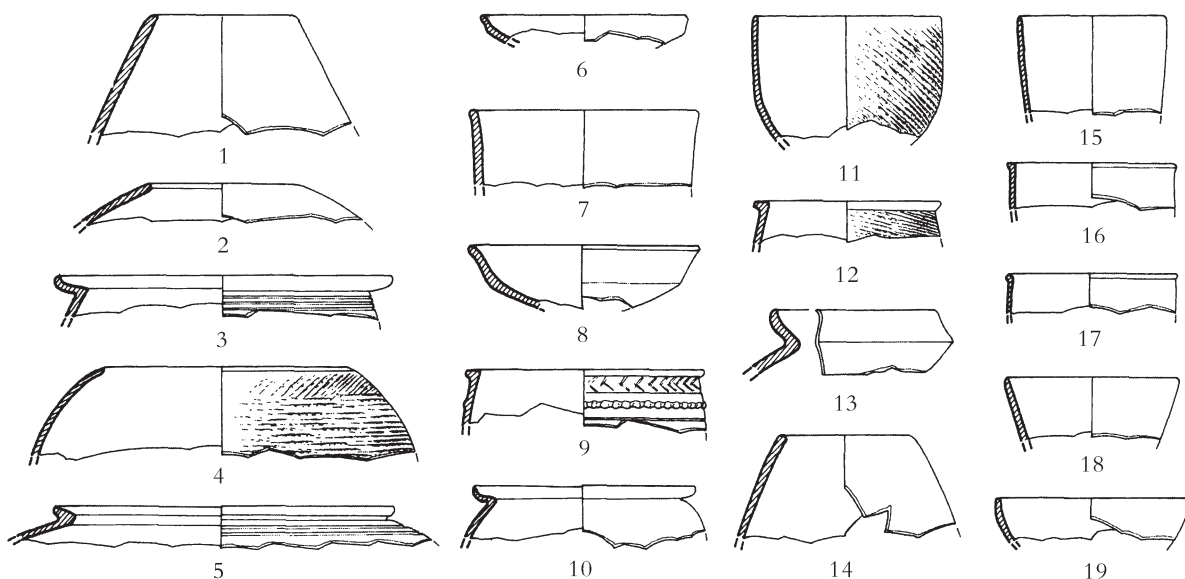
图二 1999年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地点出土三星堆遗址新二期陶器B组

1. 绳纹侈口罐 (99GSZY 夯: 75) 2. 敛口缸 (99GSZYT103 ⑩ : 15) 3、11. 绳纹釜形罐 (99GSZY 夯: 96、99GSZYT103 ⑩ : 105) 4、8. 器盖 (99GSZYT104 : 279、99GSZYH14 : 1) 5、6. 敛口瓮 (99GSZYT106 : 42、99GSZYD160 : 2) 7. 绳纹深腹罐 (99GSZY 夯: 77) 9. 瓦棱纹器盖 (99GSZYH30 : 10) 10、12. 绳纹小平底罐 (99GSZYH88 : 6、99GSZYH88 : 2) 13、16. 高柄豆 (99GSZYT105 : 52、99GSZYT102 ⑩ : 4) 14、15. 瓦棱纹高柄豆 (99GSZYT106 : 61、99GSZYH14 : 20)



图三 陶器 (A组)

1、9、10. 盘 (H73 ③ : 156、H73 ② : 100、H73 ④ : 176) 2. 绳纹花边罐 (古城 H3 : 1) 3. 圈足尊 (置信金沙园一期 H643 : 20) 4、6. 喇叭口高领罐 (T9 ④ : 3、T9 ⑤ : 2) 5. 宽沿尊 (置信金沙园一期 H643 : 34) 7. 器底 (H73 ② : 94) 8. 器圈足 (H73 ④ : 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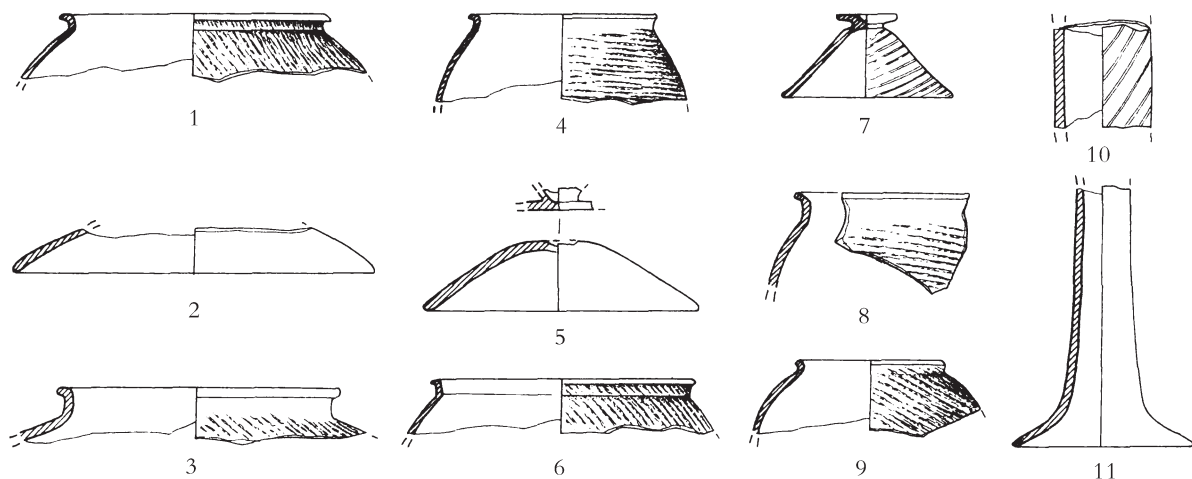
图四 陶器 (B组)

1、2、5、14. 敛口罐 (H73 ③ : 123、H73 ④ : 193、化成村 T1304 ④ : 6、H73 ③ : 122) 3、10、13. 曲沿罐 (古城 III T6 ⑥ : 13、T9 ⑤ : 83、T9 ④ : 20) 4. 敛口瓮 (H73 ④ : 180) 6、8、19. 钵 (古城 III T6 ⑩ : 46、T9 ⑤ : 78、T9 ④ : 5) 7、11、17、18. 杯 (H73 ③ : 127、H73 ② : 72、H73 ③ : 125、H73 ④ : 198) 9、12、16. 窄沿罐 (古城 II T1513 ⑤ : 7、H124 : 1、T9 ④ : 13) 15. 缸 (II H73 ④ : 171)

遗址 (地点) 分别是: 崇州双河古城遗址、<sup>[4]</sup> 新津柳河村遗址、<sup>[5]</sup> 郫县古城遗址、<sup>[6]</sup> 郫县曹家祠遗址、<sup>[7]</sup> 郫县清江村遗址、<sup>[8]</sup> 温江天乡路遗址、<sup>[9]</sup> 温江范家碾遗址、<sup>[10]</sup> 温江永福村遗址、<sup>[11]</sup> 高新西区航空港遗址、<sup>[12]</sup> 高新西区四川方源中科遗址、<sup>[13]</sup> 高新西区汇利包装厂遗址、<sup>[14]</sup> 高新西区“格威药业一期”遗址、<sup>[15]</sup> 成都十街坊遗址、<sup>[16]</sup> 化成村遗址、<sup>[17]</sup> 金沙遗址郎家村“精品房”地点、<sup>[18]</sup> 金沙遗址干道黄忠A线地点、<sup>[19]</sup> 金沙遗址强毅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地点、<sup>[20]</sup> 金沙遗址春雨花间地点、<sup>[21]</sup> 金沙遗址置信金沙园一期地点、<sup>[22]</sup> 中海国际社区遗址、<sup>[23]</sup> 电子科技大学清水河校区实验楼遗址、<sup>[24]</sup> 新都大江村遗址、<sup>[25]</sup> 新都太平村遗址、<sup>[26]</sup> 新都高桥村遗址、<sup>[27]</sup> 新都团结村遗址、<sup>[28]</sup> 新都朱王村遗址、<sup>[29]</sup> 新都正因小区遗址、<sup>[30]</sup> 新都桂林遗址、<sup>[31]</sup> 青白江三星村遗址、<sup>[32]</sup> 彭州天彭周家院子遗址、<sup>[33]</sup> 什邡桂圆桥遗址、<sup>[34]</sup> 什邡星星村遗址<sup>[35]</sup> 和绵竹鲁安遗址。<sup>[36]</sup>

根据最新发表的考古报告, 四川省文物考古



图五 陶器(C组)

1、3、4、6、8、9.小平地罐(H73③:151、H73③:153、H73④:172、H73④:173、T9④:23、H73③:150) 2、5、7.器盖(古城T3:88、H74④:175、H73④:190) 10、11.高柄豆(H73③:132、TG4G18:9)

研究院和四川大学考古学系2012年在对武胜苏家坝遗址进行的联合发掘中,也发现了与三星堆遗址“新二期”文化遗存类似的陶器群(图六),不过与三星堆“新二期”相比,B组的器物偏少,可能时代稍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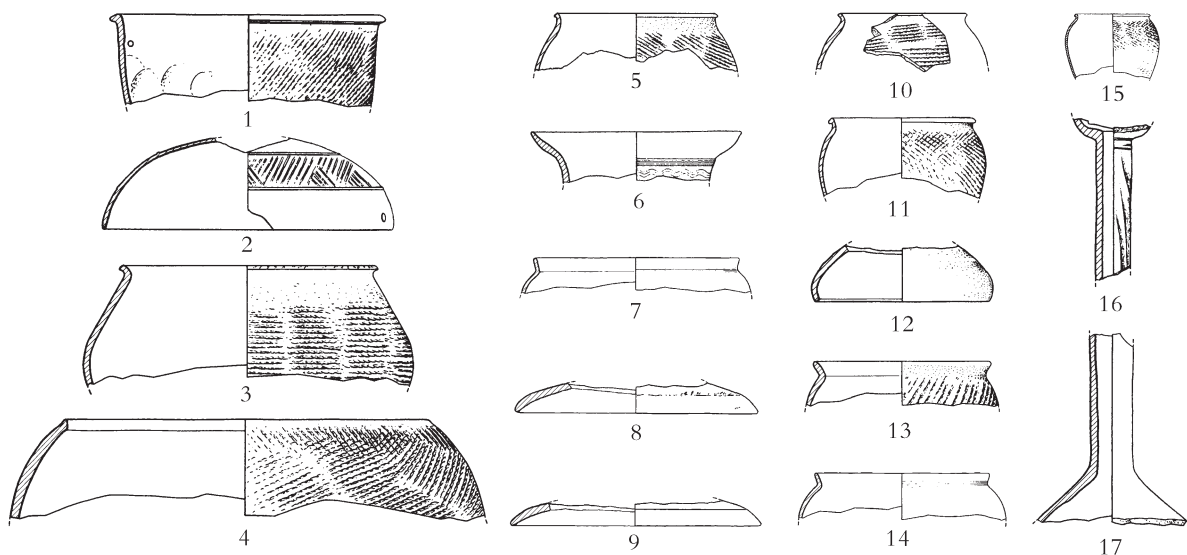
武胜位于四川盆地东部,地处嘉陵江中游,这是三星堆遗址“新二期”文化遗存在成都平原以外区域的首次发现。<sup>[37]</sup>

### 三 兼谈“鱼凫村文化”

对以这组陶器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学界目前主要有3种看法:

1.属于“宝墩文化”的第四期,亦即“宝墩文化”的最后阶段。<sup>[38]</sup>

2.属于“宝墩文化”的最后阶段,但其文化面貌又有着强烈的特殊性,是“宝墩文化”向“三星堆文化”发展的一个过渡类型。<sup>[39]</sup>



图六 2012年武胜苏家坝遗址出土三星堆遗址新二期陶器

1.筒腹罐(G3:2) 2、8、9、12.器盖(G3:6、G8:1、G8:2、T1210③:5) 3、5、10、11、15.深腹罐(T1302④:3、T1203③:9、T1305③:9、T1302③:1、G3:7) 4.瓮(T1208④:23) 6.盘口罐(T1204④:1) 7、13、14.折沿罐(H38:1、G3:4、H38:2) 16.器柄(T1305③:14) 17.灯形器(H16:16)

3.既不属于“宝墩文化”，也不属于“三星堆文化”，而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考古学文化——“鱼凫村第三期文化”或“鱼凫村文化”。<sup>[40]</sup>

笔者认为，尽管这组遗存中的A组陶器是“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晚段的常见器物，但新出现的B组陶器已明显属于三星堆文化的范畴，因此再将这组遗存归入“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显然是不合适的。同时，鉴于A组陶器比例较高，B组陶器尚未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将其纳入三星堆文化系列似乎也不恰当。考虑到以这组器物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上承新石器时代，下启青铜时代，有着极其重要和特殊的地位，又在成都平原有着广泛的分布，在四川盆地东部嘉陵江中游地区也开始有所发现，因此将其单列出来，命名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是适宜的，也是必要的。鉴于它们在三星堆遗址和鱼凫村遗址都有着丰富的遗存和集中的发现，其后继者又为举世闻名的三星堆文化，因此笔者建议将以这组陶器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统一命名为“三星堆二期——鱼凫村文化”。

注释：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广汉三星堆——1980—2005年考古发掘报告》，待出版。

[2] a.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四川省温江县鱼凫村遗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8年第12期；  
b.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温江县鱼凫村遗址1999年度发掘》，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1999）》，第40~53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c.李明斌：《再论温江鱼凫村遗址第三期文化的性质》，《华夏考古》2011年第1期。

[3] 图三至图五未标注地点者，均为鱼凫村遗址所出。参见[2]c。

[4]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崇州市双河史前城址试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1期。

[5]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津县文物管理所：《新津县柳河村先秦遗址发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12）》，第92~120页，科学出版社，2014年。

[6] a.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郫县博物馆：《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9年第1期；

b.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郫县博物馆：《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1997年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3期；

c.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郫县博物馆：《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1998—1999年度发掘收获》，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1999）》，第29~39、320页。

[7]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郫县望丛祠博物馆：《郫县曹家祠遗址先秦文化遗存试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10）》，第16~37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8]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郫县望丛祠博物馆：《四川省郫县清江村遗址调查发掘收获》，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1999）》，第146~163页。

[9]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温江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温江天乡路遗址先秦文化遗存试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10）》，第54~72页。

[10]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温江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温江范家碾遗址先秦文化遗存试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10）》，第73~85页。

[11]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温江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温江永福村三组遗址先秦时期文化遗存试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10）》，第86~102页。

[12]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郫县文物管理所：《成都市高新西区航空港古遗址发掘简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3）》，第218~233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13]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高新西区四川方源中科地点古遗址发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4）》，第53~68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14]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高新西区汇利包装厂古遗址发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9）》，第135~182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15]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高新西区“格威药业一期”新石器遗址发掘简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3）》，第165~185页。

[16] 朱章义：《成都市南郊十街坊遗址年度发掘纪

- 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1999）》，第1~28、319页。
- [17] 刘雨茂、荣远大：《成都市西郊化成村遗址1999年度发掘报告》，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1999）》，第127~145、321页。
- [18]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金沙遗址郎家村“精品房”地点发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4）》，第176~216页。
- [19]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1年金沙遗址干道黄忠A线地点发掘简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3）》，第44~88页。
- [20]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遗址强毅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地点发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7）》，第73~103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 [21]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春雨花间”发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4）》，第217~254页。
- [22]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置信金沙园一期”地点发掘简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2）》，第1~41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 [23]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中海国际社区古遗址发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5）》，第141~207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 [24]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电子科大清水河校区实验楼遗址发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6）》，第140~189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 [25]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成都市新都区大江村遗址勘探试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11）》，第175~195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 [26]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都区文物管理所：《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太平村遗址发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10）》，第103~126页。
- [27]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都区文物管理所：《成都市新都区高桥镇遗址试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12）》，第121~132页，科学出版社，2014年。
- [28]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新都区团结村商周遗址发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12）》，第133~152页。
- [29]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都区文物管理所：《成都市新都区朱王村遗址发掘报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11）》，第123~174页。
- [30]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都区文物管理所：《成都新都正街小区考古勘探发掘收获》，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3）》，第120~136页。
- [31]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新都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新都县桂林乡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3期。
- [32]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青白江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成都市青白江区三星堆遗址试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4）》，第255~282页。
- [33]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四川彭州天彭周家院子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3期。
- [34] 属于这个时期的发掘资料尚在整理。
- [35] 发掘资料整理中。
- [36] 发掘资料整理中。
- [37]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武胜苏家坝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9年第2期。
- [38] a.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广汉三星堆——1980—2005年考古发掘报告》，待出版；  
b.同[2] a；  
c.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温江县鱼凫村遗址1999年度发掘》，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1999）》，第40~53页；  
d.同[2] c；  
e.同[4]。
- [39]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广汉三星堆——1980—2005年考古发掘报告》，待出版。
- [40] a.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广汉三星堆——1980—2005年考古发掘报告》，待出版；  
b.同[2] a；  
c.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温江县鱼凫村遗址1999年度发掘》，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1999）》，第40~53页；  
d.同[2] c；  
e.同[4]。

（责任编辑 张春秀）